

書評

黃庭碩*

伊吹敦

《中国禅思想史》

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21年，928頁，ISBN 9784881823262

在近代確立的中國禪宗史研究裡，禪思想史一直是備受研究者關注、甚至帶有「第一義」色彩的核心課題，是以相關研究無代無之。若以著名的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1867-1934）於1925年出版的煌煌巨作《禅学思想史》為嚆矢，中國禪研究者在往後近百年裡至少又產出十來部題名中冠有「禪（宗／學）思想史」的專著，¹更不要說未明確標舉此語的禪史研究，也幾乎都有觸及禪思想議題，足可窺見其經久不衰的研究傳統與活力。不過，儘管既有成果已豐碩如斯，日本禪史學者伊吹敦於2021年6月推出的《中国禅思想史》一書，無疑仍擁有雄據一席的分量。

作者伊吹敦為當今研究中國禪宗史的一線學者，長年任教於東洋大學文學部東洋思想文化學科。從其發表文章可知，作者的中國禪宗史研究

2022年2月25日收稿，2022年10月27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Huang Ting-shuo,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 早期代表作品有鈴木大拙《禅思想史研究》系列（東京：岩波書店，1943）與関口真大《禅宗思想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6），其後以此為名的著作族繁不可備載，權且從略。

約始於 1980 年代後期，即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階段；1991 年以降，他每年都有禪宗史論文發表，產量相當可觀。作者的成果有很大比例集中在其最早入手的初期禪宗史，特點是善用各類文獻——舉凡敦煌本禪籍、禪宗系偽經、日本保有的古禪籍，乃至同時代的宗外文獻等——重構初期禪宗的樣貌與發展。晚近則憑藉他深厚的禪史基底，進一步涉足日本古代佛教史及近代佛教學術史，可以預期，這將是其往後幾年的主要耕耘領域。² 在單篇論文外，作者還曾在 2001 年出版《禪の歴史》（京都：法藏館）一書，並先後翻譯印順法師（1906-2005）的《中國禪宗史》及 Joseph Adler 的 *Chinese Religions*（與尾形幸子合譯）。³

2021 年出版的《中国禅思想史》是作者的第二部個人專著。據本書前言，作者在構思第一部專著時，原想一口氣將中、日禪宗所涉及的歷史、思想、文化等課題盡數網羅，但當他真正開始寫作時，旋發現此構想過於龐大，遂果斷放棄，轉將焦點限縮在歷史發展層面，故以《禪の歴史》名其首部專著。但作者並沒有就此忘卻原先設想。在《禪の歴史》出版三年後（2004），他乘著《禅文化》雜誌的撰文邀請，開始連載名為「要說・中國禪思想史」的專欄，且回數從原先預定的八回不斷延長，結果一路連載至 2019 年，足足累積了五十七回之多。是年，他決定著手將這批連載文章重新組織成更具系統的專書，終在 2021 年以《中国禅思想史》的面貌問世。⁴ 與二十年前出版的《禪の歴史》相較，此書並未納入日本部分，然整體篇幅有增無減，⁵ 顯見作者必然花費遠較前著為多的精力探究中國部分，這對關心中國禪史的讀者來說自為一大福音。

此書體量龐大，囿於書評篇幅和一己學力，本文不打算贅述內容，僅

2 伊吹先生服務的東洋大學「學術情報リポジトリ」僅列出其部分文章，若想掌握更完整的篇目，可參考伊吹先生在 Academia 網站的個人頁面，或「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佛學著者規範資料庫」（<https://buddhism.lib.ntu.edu.tw/DLMBS/author/>）及「印度學佛教學論文數據庫」（<https://www.inbuds.net/>）的收錄資訊（2022.3.14 上網檢索）。

3 出版資訊為《中国禅宗史：禅思想の誕生》（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中国の宗教》（東京：春秋社，2005）。

4 （日）伊吹敦，〈前言〉，《中国禅思想史》（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21），頁 1-2。

5 《禪の歴史》的中國篇僅 170 頁，約為本書的五分之一。

擬重點式引介最值得留意的兩大特點。首先是涵蓋範圍之全面。事實上，若拿同樣冠以「禪（宗／學）思想史」的同類著作相比，可以輕易發現，儘管具有鼻祖地位的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即已嘗試對禪法傳入中土後的發展進行全面性的探查——具體說來是後漢至清——然其後學不僅甚少沿用，反多將焦點集中在隋唐時代，鮮有觸及宋代以降者。究其原因，當與敦煌禪宗文獻在該書出版後稍晚開始廣受禪史學界的注意與運用有關。如所周知，忽滑谷氏大作問世後五年（1930），胡適（1891-1962）發表了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神會和尚遺集》，對學界的既有禪史認知帶來巨大衝擊。雖有學者主張胡適之所以留心神會，極可能就是受到忽滑谷氏啟發，⁶但他終究通過更為新穎且直接的文獻，證成神會在初期禪史的特殊意義，是以觸發的迴響遠為強烈，也從而促使禪宗研究者大舉投身敦煌文獻，試圖複製其成功經驗，重書禪宗歷史。

從後見之明看來，胡適帶起的敦煌文獻熱潮，對禪宗研究的推進確實貢獻厥偉，因為在他之後，各國禪史學者又陸續發掘出許多傳世未見的禪宗文獻，大幅豐富了人們對禪宗歷史的認識。但與此同時，也應留意這股效應似乎過多地將學界關注導向禪宗的初期發展階段，相對冷落了其後歷史。原因無他，因為敦煌藏有的漢文禪宗文獻，基本集中在敦煌被吐蕃占領的唐貞元二年（786）以前，⁷這也使得試圖通過敦煌文獻進行禪宗研究的學者，勢必只能將焦點擺放在中唐之前。根據目前的禪史認識，中唐以前大抵屬於宗系林立的「初期禪宗」階段。至於壟斷宋代以後傳承的青原、南嶽兩大脈，約莫要到此期末尾才嶄露頭角，而其真正開始大肆發展、晉升為禪林主流的九、十世紀，則基本不在投身敦煌文獻者的關注範圍。前述傾向雖在近年隨著學界的反省出現改善，然當前業績仍以晚唐、五代、兩宋為主，⁸是故學

6 江燦騰，〈胡適與忽滑谷快天：再探胡適早期禪學研究問題〉，《漢學研究通訊》30.4（2011.11）：1-10。

7 見（日）篠原寿雄、田中良昭編，《敦煌佛典と禪》（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8 近年對晚唐五代禪宗的關注，見賈晉華，《古典禪研究：中唐至五代禪宗發展新探（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2-11。五代禪宗成果見（日）柳幹康，《永明延寿と『宗鏡録』の研究：一心による中国仏教の再編》（京都：法藏館，2015）；Benjamin Brose, *Patrons and Patriarchs: Regional Rulers and Chan Monks*

人縱想融會晚近成果新寫禪宗史，仍頗難避免頭重腳輕的情況。

不妨以稍早本書出版的小川隆（1961-）《中国禅宗史：「禅の語録」導讀》（東京：筑摩書房，2020）為例，該書雖以「禪宗史」為名，然實際檢閱內容，即可發現其涉及的時代絕大部分落在唐、宋，接著就轉至二十世紀的中國禪研究，如此設計固與小川先生的研究成果緊密扣合，仍多少反映學界對元代以降禪宗關注之有限。與此相較，本書作者很有意識地要在時段分配上保有平衡，由是大幅添增其他學者較少涉及的元代以降比重。僅就章目與頁數論，本書一至五章約屬唐代以前，有 263 頁；六至十章主要處理五代、兩宋與金，計 271 頁；十一至十五章從元、明、清一路論至近、當代，共 294 頁，換言之，元以降的禪思想發展不僅占據本書近三分之一，且其間的各個時段均有觸及、無一遺漏，甚至還納入同類作品甚少出現的近、當代部分。如是編排，幾可說是繼忽滑谷快天大作之後最全面的中國禪思想史作品，極適合充作入門書或教科書使用。

在力求全面的同時，作者還充分檢討既有研究，並盡可能將自己的思索與成果融貫其中。在序章裡，作者指出敦煌禪宗文獻的發現，誠為禪宗研究提供了重要突破口，然前賢的考索似有過於聚焦在「燈史」（禪宗史書）類文本及其周邊的傾向——因為此類材料蘊藏最多與傳世認知不同的傳承系譜——以致相對忽略他類文獻的研究潛能。有鑑於此，作者甫踏入初期禪宗研究領域，就刻意挑選較少為前賢深究的敦煌本禪籍（如《大乘無生方便門》、《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決》）、被斷為「禪宗系偽經」的《心王經》，及禪宗系的經典註釋書（如署名金剛藏菩薩的《金剛般若經註》）作為下手處；後又進一步注意到傳入日本的初期禪宗文獻（如署名慧能的《金剛經解義》），乃至同一時期的宗外文獻（如淨土先驅慈愍慧日的《淨土慈悲集》）亦皆蘊藏著關於初期禪宗的重要線索，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宋代禪宗成果見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eds.,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日)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成都：巴蜀書社，2008）；(日) 小川隆，《続・語録のことば：『碧巖録』と宋代の禅》（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10）。

遂開風氣之先地對這些材料展開拓荒性研究。⁹

正由於作者自研究伊始即嘗試跳脫既有視界，設法立足在更寬廣的材料基礎觀察初期禪宗發展，是以他對這段歷史的解讀，很自然地要較其前輩宏闊。用他自己的話講，即是更能從「社會整體」角度把握禪宗的位置及思想變化意涵。¹⁰ 以其初期禪宗研究為例，他先基於《心王經》等「禪宗系偽經」所示，主張禪宗起源於游離於國家體制、力圖在山林之中通過禪定獲得開悟體驗的修行者，同時還將《大乘無生方便門》等敦煌本禪籍與燈史材料結合，推斷在四、五祖時代壯大的「東山法門」大抵延續了此山林傳統，是以一方面聚集了許多以「求悟」作為共同目標、奉菩薩戒為共同規範的僧俗二眾，同在山林中過著集體勞動生活，另一方面又給予他們大量個人時間修習「坐禪＝觀心」之法，以求提升一己境界。此僧俗並重的東山法門，在神秀(?-706)進軍洛陽後很快引起京城知識界的震動，風從者有之、產生危機意識者亦有之——如慈愍慧日(680-748)所撰的《淨土慈悲集》即留有不少批判禪宗的段落。但隨著神秀一門日漸在京城紮根，其後學也開始修正其原有的法制外(outlaw)路線，試圖加重戒律、經教在踐行中的比重，以避免受到批評與攻訐，上面提到的禪宗系經典註釋書，大抵就是在此脈絡下產生。¹¹

惟就禪宗自身立場，神秀後學的路線調整，可謂是對原有精神的背離，從而激發出神會這位標舉「南宗」正脈的批評者。神會的立宗目標在其弟子輩手上獲得完成，而作者尤為重視在大曆年間(766-779)獲代宗詔命入住長安招聖寺的慧堅(719-792)。他認為，曾在該地為其師製作七祖像的慧堅，很可能就是敦煌本《壇經》、號稱慧能(638-713)所撰的《金剛經解義》，及《曹溪大師傳》諸文本的幕後推手。通過其操盤，慧能的「六祖」形象及與《金剛經》的密切關係被牢牢確立，成為後世禪林共識。有意思的是，作者同時指出，慧堅的立場似也伴隨其深入體制改變，這反映在最晚成書的《曹溪大師傳》特意刪除易引起禪宗對立的段

9 相關成果散見於作者的1990年代研究。

10 (日)伊吹敦，《中國禪思想史》，頁16-20。

11 同上註，頁21-113。

落，轉而加重敘述慧能如何再三受到皇帝邀請的情節上。由此看來，神會開創的南宗荷澤系似也漸向國家體制趨攏，再難貫徹禪宗原有精神。所幸，約莫就在荷澤系被國家收編之際，代表南宗南嶽系的馬祖道一（709-788）和青原系的石頭希遷（701-791）應時而起：他們承襲了東山法門路線，在體制外的山林創立禪居，建立自己的規範，教導追隨者應在日常生活中尋求證悟。作者認為，其主張正好給予安史亂後的動盪人心直面現實之勇氣，遂得在八、九世紀之交獲得飛躍性成長，從而奠下在晚唐壟斷禪宗傳承的基礎。¹²

根據以上概括，可以清楚看到作者的初期禪宗研究帶有同類著作較少見到的社會史關懷，也因如此，其思想討論往往具有相應的社會性基底，與純思想、哲學式辨析頗異其趣。重要的是，此社會性視角實際上不僅限於本書的初期禪宗部分，更貫串了整部作品。比方說，作者主張五代時期的政治紛亂，大幅限縮了禪僧尋訪諸方宗匠的參學機會，讓他們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投注在古德問答上，或嘗試用更普遍化的方式追求開悟，從而造就出「拈語」、「代語」、「機關」等新教學方法；另一方面，為在亂世裡求存，五代禪宗也開始積極靠向國家體制，由此出現與教家、淨土等不同佛教傳統妥協的呼聲。北宋以降禪宗則基本成為國家佛教之部分，是以不僅在佛教內部採取更為圓融的姿態，更因應士大夫群體的壯大，著意融入更多文化因子，並提倡「本覺」、「三教一致」等較易為俗眾接納的見解，遂使禪宗日益世俗化，喪失了其思想的獨特性。至於禪思想在近代的重興，作者則歸因於其時的知識分子設法在固有思想資源中找尋能夠因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企圖，是以除了太虛（1890-1947）這樣的教界人士，他們多將禪思想視作得與現代科學整合之「哲學」，罕有從「宗教」角度進行認識與把握者。¹³

以上論及的涵蓋範圍之全面，和對思想之社會基底的關注，可謂本書最有別於同類著作的兩大特色，至於未及介紹的其他優點，就留待有興趣的讀者自行發掘。文末，仍不免俗地想指出本書幾個未盡之處：一、作者

12 （日）伊吹敦，《中國禪思想史》，頁 115-239。

13 同上註，頁 285-782。

或許將本書定位為面向大眾的讀物，因此沒有嚴守繁複的學術體例，而是盡量從簡以免妨礙閱讀，考慮到本書體量，這般選擇自有道理，但若有讀者想進一步覆按引文，或查核立論依據，當前編排無疑不甚便利。所幸作者前著《禪の歴史》臚列了豐富的二手研究，可稍作補充。二、此書其實鑄鑄許多作者的個人見解，但行文時卻鮮少言明，或許會讓不很熟悉相關研究的讀者逕將其說視為學界共識，因此要特別提醒讀者在閱讀本書之餘，仍應參看其他學人的研究。¹⁴ 三、儘管作者已盡可能加重元、明、清比重，但這些時段畢竟不是其專攻，加上二手研究相對稀少，內容難免較宋代以前單薄，且在其敘事框架裡，宋代以降就是禪宗愈趨體制化、世俗化的時段，因此他特別突出其時思想的融通傾向——如「禪教合一」、「禪淨雙修」、「三教一致」等——並主張此反映禪宗日漸失去其所以為禪宗的立足點。此評斷帶有濃重的「純禪」優位意識，但這未必是理解近世禪宗的唯一進路，如明代佛教研究大家荒木見悟（1917-2017），即曾從現實環境之迫切需求，正面評價晚明禪家之融通傾向。¹⁵ 就此而言，宋代以降的禪思想詮釋，顯非唯有本書勾勒的角度足以當之。

總括來說，這本新作可說是當前最完整、詳備的中國禪思想史專著，不僅值得禪宗研究者細覽、借鏡，也很適合推薦給對禪宗懷有興趣的讀者作為基礎入門書。期待作者能在不久的將來，持續推出《日本禪思想史》、《中日禪文化史》諸作，完滿其撰作初衷。

14 如本書並未對馬祖禪和石頭禪進行明確分判，然其間差別卻是小川隆非常著意的部分，見（日）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中国禪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11），頁 41-147。

15 關於荒木見悟對「純禪」取徑的不滿，見廖肇亨，〈荒木見悟明代佛教研究再省思〉，《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1(2021.3): 49-53。

